学术专论

论《四库全书总目》与违逆乾隆帝意旨之例

倪宇航

[摘要] 乾隆帝赞同王通“文如其人”的思想并对其醇儒的身份予以认同，但馆臣对王通予以抨击。二者皆以贬斥宋学为目的，且馆臣并未批判王通“文如其人”的思想。乾隆帝否认“三传”对《春秋》的阐释效用并提倡以经释经，馆臣则持相反意见。双方的目的皆是对“言”予以控制，但因身份的不同采取了截然相反的阐释形式。乾隆帝对香奁体有贬无褒，并明令馆臣撤出《四库全书》中的香奁诸作。然馆臣认可香奁体之价值并收入《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帝视香奁体为纯文学之作，馆臣则额外赋予其“经”的价值。馆臣虽有诸多看似违逆乾隆帝意旨之举，但本质上未与其相左。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 乾隆帝 馆臣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3－0067－015

自清至民国，绝大多数学者将《四库全书总目》（后文皆简称《总目》）的著作权归于纪昀，[①] 但新世纪以来，学界以杨晋龙、夏长朴、司马朝军等人为代表，认为《总目》体现的思想旨趣以乾隆帝意志为主。[②] 然而，在周积明和黄琼谊看来，馆臣并非事事皆遵照乾隆帝旨意行事，而是有所背离：周氏以乾隆帝“布帛菽粟之旨”“元白陆诗论”“天理人欲论”三者为例，认为馆臣对乾隆帝意旨有违逆之处。[③] 黄氏则以集部为例，认为馆臣对元曲、青词、香奁体等文体之态度与乾隆帝有异。[④] 两位学者由此认为，乾隆帝对《总目》并非拥有绝对掌控权。二人的研究对于探讨《总目》著作权的归属有极大益处。但纵观二者之论述，多集中于集部的探究，对于此部之外的研究，则稍显薄弱，且黄氏在探讨香奁体时认为，纪昀与乾隆帝文学思想的不同，是《总目》的具体著录与乾隆帝旨意出现偏差的原因。笔者对黄氏的这一观点并不认同。因此，本文就周、黄二位学者尚未涉及的《总目》违逆乾隆帝意旨之例——关于对隋儒王通的评价以及《春秋》的阐释方法进行探讨，并对黄氏一文中关于香奁体的观点予以商榷。本文证明，虽

[收稿日期] 2023-07-05

[作者简介] 倪宇航（1995— ），男，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nniyuhang@qq.com

① 周积明：《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再检讨》，《中国四库学》2019 年第 2 期。

② 杨晋龙：《论〈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诗经学的评价》，中国诗经学会编：《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 年，第 441 页；夏长朴：《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91 页；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87 页。

③ 周积明：《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再检讨》，《中国四库学》2019 年第 2 期。

④ 黄琼谊：《〈四库全书总目〉对乾隆旨意依违之例——以集部为考察中心》，《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第 121 期，2011 年。

然《总目》有诸多看似与乾隆帝意旨相抵牾之处，但二者归根到底并未发生冲突，在涉及重大原则性问题时，馆臣无不以乾隆帝意旨为准。

一、关于王通的评价

王通，隋末大儒，字仲淹，卒后门人私谥其为文中子，今传有记录其言说的语录体著作《中说》。对于王通其人，乾隆帝在多方面予以认可，乾隆十九年（1754）有谕：

> 朕于场屋之文，屡谕以清真雅正，俾知所宗尚久矣。乃者或逞为汗漫之词，徒工绮丽，甚至以汉唐词赋，阑入其中，律以大雅之言，甚无当也。文之浮薄，关于心术，王通论之详矣。①

乾隆帝认为，科考之文当以清真雅正为正宗，但应举之士往往以汗漫绮丽之词敷衍全文。故乾隆帝以王通“文与心术”之论为依据，对此现象予以批判。乾隆帝所引王通之论，源于王通“文如其人”的文学思想，即人品和文品具有绝对一致性。王氏《中说·事君篇》载：“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② 同篇又谓：“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③ 可见，在王通看来，人与文具备十足的互通性和一致性。换言之，在王通视野里，人本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素质对于文章风格的特点具有决定性作用；反之，作品之风格也完全能映射出人的心术是否端正。那么，评判个人和文章的标准为何？在王通眼中，当以是否符合儒家政教观为准：

> 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④

王通认为，应玚、刘桢、沈约、谢朓诸人工于诗歌形式方面的音律技巧，而忽略了诗歌更为深层的内在意蕴的表达，故乃诗之“末流”；“一流”的诗歌必要明三纲五常且能从之征存亡得失，见志向变化。由此则知，儒家温柔敦厚式的能反映政教风俗得失的功利文学才是王通眼中的标准文学。

故乾隆帝以王通“文如其人”的文学观对科场之文予以评判和限定，无疑是对王通的儒家诗教观予以认同和赞誉。又，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殿试策文，乾隆帝问：“隋儒王通有《中说》十卷，其粹远过荀、扬，学者转以僭经訾之，何欤？”⑤ 乾隆帝此话有两层意蕴：第一，站在儒家立场认为王通学问之纯粹远胜于荀子、扬雄。王通乃儒家礼乐文化的捍卫者，其极力赞扬儒家的纲常伦理之道，如《中说·王道篇》曰：“子游孔子之庙，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⑥ 且王氏又以弘扬儒家文化为己任，其《天地篇》有言：“子曰：‘……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⑦ 不仅如此，他还对佛道二教予以抨击。《周公篇》说：“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⑧《礼乐篇》道：“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

---

① 《清高宗实录》卷461，乾隆十九年四月乙巳。
② 张沛：《中说校注》卷3《事君篇》，中华书局，2013年，第83页。
③ 张沛：《中说校注》卷3《事君篇》，第79页。
④ 张沛：《中说校注》卷2《天地篇》，第43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883，乾隆三十六年四月辛卯。
⑥ 张沛：《中说校注》卷1《王道篇》，第27页。
⑦ 张沛：《中说校注》卷2《天地篇》，第58页。
⑧ 张沛：《中说校注》卷4《周公篇》，第114页。

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①] 由此可见，王通极力维护儒家之道，也即乾隆帝所谓"粹"。

而在乾隆帝视野里，荀子和扬雄则有不"粹"之处，有其诗《定州咏韩苏甲乙》为证。该诗尾联首句为"荀卿曾议十二子"，乾隆帝自注曰："荀卿有《非十二子》篇……至以子思、孟轲为饰邪说，文奸言……其言甚不醇粹。"[②] 乾隆帝又有《日讲礼记解义序》一文，认为《礼记》的"精言奥义往往与《易》《诗》《书》《春秋》相发明，非董仲舒、扬雄辈所及"。[③] 在他眼中，荀子抨击子思、孟子之说，非为一醇儒，扬雄之言则不如《礼记》的精言奥义，二者皆有不当之处，因而不如王通学问之纯粹。据此可知，乾隆帝赞王通"其粹远过荀、扬"之意。

第二，乾隆帝认为，王通儒学纯粹，但"学者转以僭经訾之，何欤"？乾隆帝以此向诸贡士提问，表示其对此亦有疑意。参稽相关典籍，所谓"学者转以僭经訾之"乃指宋儒司马光、朱熹等人抨击王通续经一事。王氏以儒家道统传人自居，并效仿孔子作六经，其《中说·礼乐篇》言："子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④] 但司马光、朱熹等人对此事予以诘难。司马光在为王通所作的《文中子补传》中谓："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⑤] 朱子则抨击王通："文中子续经，犹小儿竖瓦屋然。世儒既无高明广大之见，因遂尊崇其书。"[⑥] 二人不满王通之意溢于言表，但乾隆帝"其粹远过荀、扬"一语表明了对王通的肯定，且"何欤"二字强烈的疑问语气道出了其维护王通之心。

乾隆帝为何维护王通，后文有详论。于此，我们可知，乾隆帝对于王通"文如其人"的文学思想以及其醇儒的身份予以认同。

然而，在《总目》中，馆臣笔下的王通却是另一番面貌，《中说》提要谓：

> 且摹拟圣人之语言，自扬雄始，犹未敢冒其名。摹拟圣人之事迹，则自通始，乃并其名而僭之。后来聚徒讲学，酿为朋党，以至祸延宗社者，通实为之先驱。《坤》之初六"履霜坚冰"，《姤》之初六"系于金柅"，录而存之，亦足见儒风变古，其所由来者渐也。[⑦]

《子部·儒家类小叙》言：

>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⑧]

在馆臣眼中，王通摇身一变，竟成了败坏儒学风气乃至祸延宗社的始作俑者，此与乾隆帝对王通的评价可谓大相径庭。那么，缘何如此？我们先分析馆臣之语。第一，馆臣所谓"乃并其名而僭之""无敢自命圣贤者"诸语指王通以圣人自任。王氏谓："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⑨] 后世之人亦多有视王通为圣人者。如唐末司空图说："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⑩] 宋初柳开亦曰："隋之时，王仲淹于河汾间，

---

① 张沛：《中说校注》卷6《礼乐篇》，第172页。

② 《御制诗五集》卷72《定州咏韩苏甲乙》，《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9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83–484页。

③ 《御制文初集》卷11《日讲礼记解义序》，《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10册，第402页。

④ 张沛：《中说校注》卷6《礼乐篇》，第165–166页。

⑤ 司马光：《文中子补传》，曾枣庄主编：《全宋文》第56册卷1225，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

⑥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8册卷137，中华书局，1986年，第3270页。

⑦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91《中说》，中华书局，1997年，第1201页。

⑧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91《儒家类小叙》，第1193页。

⑨ 张沛：《中说校注》卷2《天地篇》，第58页。

⑩ 司空图著，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笺校》卷5《文中子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务继孔子……实为圣人矣。”[①] 可见，王通实以儒家圣人的身份自居、传道，且后人亦多视其为圣人。

第二，馆臣“摹拟圣人之事迹，则自通始”“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诸言则指王氏效仿孔子聚众讲学，门人甚多。其弟王绩《游北山赋》一文描摹了王通讲学的盛况：“白牛溪里，岗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其自注道：“吾兄通……大业中隐于此溪，续孔子‘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②] 由此可见王通门人之多与讲学之盛。

第三，馆臣所谓“后来聚徒讲学，酿为朋党，以至祸延宗社者……亦足见儒风变古，其所由来者渐也”“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诸语则指王通乃汉宋学风转变的渊源所在。馆臣将数千年经学史之发展归结于汉学和宋学的争斗：

>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③]

馆臣在此虽名义上宣称汉宋两家互有胜负，然而学界公认，其实际立场乃崇汉贬宋，[④] 对于汉学其多有维护，如《经稗》提要曰：“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征。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⑤] 可见，对于汉学的专门授受，谨守师法，馆臣持赞扬之态。但宋学和汉学不同，宋学尚门户，又好讲学。“考宋儒标榜门户，以劫制天下之异论。”[⑥]“盖讲学之家于一字一句之异同，务必极言辨难，断不肯附和依违。”[⑦] 在馆臣看来，宋学的这些风尚危害极大：“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⑧]

据此，按馆臣之意，在王通之前，儒者尊崇汉学，谨守师法而已；至王通时，遂开讲学朋党之风，此风流变而为宋学，可谓流毒无穷。那么，馆臣如此公然违逆乾隆帝对王通的积极评价，并转以恶意相加，原因何在？实际上，馆臣并未与乾隆帝意志相左，其根本出发点亦以后者为依据，这需要从两方面予以论述。

一方面，乾隆帝颁布的两道关于王通的谕旨分别为其达到了两个目的。其一，矫正文风，茂选才士。清廷对时文风气极为重视，屡次下旨厘正文体。乾隆帝即位之初即诏曰：“前蒙皇考世宗宪皇帝特降谕旨，以清真雅正为主，诚以肤浮者，非有物之言；而诡异者，非立诚之旨。文品人品，恒相表里；雅郑之分，淄渑之别，辨之不可不精也。”[⑨] 乾隆十九年，所谓“清真雅正”“文品人品”诸语词在前引关于王通的诏谕中再次提及。乾隆二十四年，针对科场时文，其再次宣谕：“将能为清真雅正之文，而其人亦可望为醇茂端谨之士。”[⑩] 故而，在乾隆帝看来，文品和人品具有一致性。因此，在谕旨中乾隆帝用王通“文之浮薄，关于心术”此“文如其人”之思想，乃是为了矫正当时的不良文风，使科场之文符合“清真雅正”的标准，进而供其茂选醇茂端谨之士。

---

① 柳开：《补亡先生传》，曾枣庄主编：《全宋文》第6册卷127，第396页。

② 王绩：《王无功文集》卷1《游北山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叙》，第1页。

④ 夏长朴认为，“学界公认《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立场是立足汉学，贬抑宋学，也就是所谓‘崇汉抑宋’。这个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夏长朴：《尊〈序〉、废〈序〉与汉宋对峙——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为例》，《中国经学》2022年第1期。

⑤《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33《经稗》，第437页。

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37《圣门释非录》，第494页。

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35《癸巳论语解》，第464页。

⑧《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33页。

⑨《清高宗实录》卷20，乾隆元年六月丁卯。

⑩《清高宗实录》卷602，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其二，贬斥宋学。在前引乾隆三十六年关于王通的殿试策问中，乾隆帝认为王通学问纯粹，但学者转以僭经訾之，此作何解？其实，如果我们将其与乾隆帝下个策问联系参看，乾隆帝此问实大有深意：

> 隋儒王通有《中说》十卷，其粹远过荀、扬，学者转以僭经訾之，何欤？嗣是言心性莫若宋五子。周子《太极图说》，以中与正并举；程子言忠恕犹中庸，不可偏举。能缕析其底蕴欤？①

乾隆帝此段问话可谓蕴含了复杂的帝王心术：恰如前文所说，他认为王通乃一纯粹的儒者，但学者予以訾之。细析之，乾隆帝在此所谓“学者”乃指宋儒，这不仅因为首訾王通僭经者为宋儒司马光，且大量批判王通僭经者亦为宋儒，②更因为继王通后，下个策问的内容便是有关宋儒的学问。乾隆帝此段话当作如是解：王通之学乃纯粹的儒学，但学者反而訾之，原因何在？继之而来，世人皆以宋儒心性之学为儒学正宗，如周子、程子皆有心性之说。乾隆帝则据此，表面问询诸贡生能否剖析宋儒学问之底蕴，但更深层之意乃是质疑宋儒之学能否析透儒家心性之学，其言下之意即：非是王通之学不纯而是世人皆以宋儒之学为正宗，其维护王通及怀疑宋儒之心昭然可见。此番释解并非向壁虚凿，而是有两个证据。第一，乾隆帝所举周子、程子之例中，程颐恰不仅有否定王通续经之说更有批判王通心性之学之语，其谓：“文中子续经甚谬……”③又言：“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乱说……”④而乾隆帝对二程之学说甚为精通，其尚未登基时就作有《明道程子论》一文，对二程学问之渊源、师承、差异等皆有论述。⑤那么，就此而言，乾隆帝对此策问的安排可谓大有深意——其以王通为跳板，对宋儒之说法予以质疑。细言之，乾隆帝前有称赞王通儒学纯粹之语并对宋儒訾责其续经一事表示不解，后又问询诸贡生能否剖析宋儒心性之学的底蕴。而在这当中，宋儒程颐又对王通续经一事及其心性之学予以否定。可见乾隆帝乃有意识地认同王通之学而怀疑宋儒之学。

第二，纵观整个乾隆朝的殿试策问，如以宋学及其对立面汉学作对比，乾隆三十六年可谓一分水岭。此年之前，以对宋学的考察为主；此年之后，以考察汉学为主，且对宋学有所贬斥。如，乾隆三十六年前有元年丙辰科对执中之道的考察，二年丁巳恩科有对诚敬之道的体察，七年壬戌科有对君民之道的问询，二十八年癸未科又有对心性之学的考问，等等。可以看出，这些策问都是针对宋学而发。但自乾隆三十六年后，对宋学的考察则呈现由盛转衰的局面。三十七年的壬辰科不仅未涉及宋学，反而出现了对音韵学知识的考察。其后，四十年乙未科虽出现对《大学》《中庸》二书的考察，但同时也出现了对目录学知识的审察。而从此次科考后，直到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才再次出现对宋儒义理之学的专门考核。在四十年至五十八年之间，不仅没有出现对宋学的专门考察，反而多次对宋学予以诘难。如四十三年戊戌科和四十六年辛丑科，乾隆帝皆有对朋党门户之危害的垂问，而据状元的殿试答卷来看，皆有对宋儒的抨击。戊戌科状元戴衢亨说：“宋则有洛党、蜀党各为排击。夫以程颐、苏轼诸儒而犹不免于此，则知不党之学诚未易言也。”⑥辛丑科状元钱棨曰：“宋之蜀、洛，交树党援，互相倾轧矣。”⑦二者皆对宋学党风攀援的现象予以抨击。更甚者，乾隆帝在策问中直接否定了宋学，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乾隆帝问询：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883，乾隆三十六年四月辛卯。

② 关于宋儒訾责王通续经一事之详情，参见郭畑：《宋儒对于王通续经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

③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 19，《二程集》第 3 册，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62 页。

④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 15，《二程集》第 3 册，第 155 页。

⑤ 《乐善堂全集定本》卷 6《明道程子论》，《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 1 册，第 95 页。

⑥ 邓洪波、龚抗云编：《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572 页。

⑦ 邓洪波、龚抗云编：《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589 页。

宋儒谓有举其辞而不能通其义者矣，未有通其义而不能举其辞者也。简策异同，微言实关大义，诸经互引，厥有殊词。唐人刻石犹存，或间与今判。郭氏之《易举正》，王氏之《诗考》，杂胪歧出。《礼》之《大学》，《书》之《武成》，考定纷如。《春秋》经文，"三传"间别。诵习有素，其能赅橥而条系欤？[①]

宋儒认为，义理重于语辞。但乾隆帝以为"微言实关大义"，并以唐人石刻与后世之人对经文之考订为例考察诸贡生，无疑认为"辞"并非宋儒所认为的不如"义"之重要。试看该科状元茹棻对此策问的回答：

诸经自汉初至今，由科斗而篆而隶而楷，字凡数易，诚不免乌焉亥豕之讹。况汉初经师分教弟子各有专门，则其间语音之不合，授受之不同。延及唐宋，其义纷如……至石经之与雕板，则自汉之三体石经以来，唐人刻石幸而仅存，纵有间见错出，亦足以备参考而广异闻。我皇上尊经重道，于诸经莫不考订详明，颁示遐迩，俾士人得以家有一编，朝吟夕讽，岂非同文之极盛也耶！[②]

可见，茹棻亦是重视对"辞"的梳理，并恭维乾隆帝"于诸经莫不考订详明"。可以看出，乾隆帝此问实际上乃是重视汉学考订字词、语音的功夫，而对宋儒仅重视义理学问之举予以否定。

与之相应，在对宋学予以掊击时，乾隆帝对汉学的考察愈加频繁。除前举诸例外，四十三年戊戌科有对书籍贮藏的考察，五十二年丁未科有对史书体例的考察，五十四年己酉科又涉及五经章句的考订，等等。如此诸多的策问皆是针对汉学所擅长的考据功夫而发。

由此，乾隆三十六年实乃乾隆帝对宋学态度转变的关键之年。在该年策问中，乾隆帝对王通之肯定以及对宋儒心性之学的看法，实际上已透露了其心声的端绪——以对王通学问的肯定而质疑宋学之正宗。夏长朴认为，以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界点，此年之前乾隆帝称赞宋学，之后打压宋学。[③]但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以王通为切入点，在乾隆三十六年时，乾隆帝实已对宋学有所打压。因而，此番探讨亦可对学界当前盛行的相关说法提供另一种考虑。

另一方面，馆臣批判王通乃是着眼于批判宋学。在《总目》中，馆臣对宋学大体持贬斥之态，而批判王通之目的正是为宋学的不良学风寻一学术起点。馆臣论学，尤重渊源传承，如其各部大叙，各类小叙，无异于一部部学术简史。那么，馆臣屡屡批判的宋学亦有传承，其引《易》之"履霜坚冰""系于金柅"为喻，已明白无疑道出：王通"教授河汾"之举正是馆臣所认为的宋学渊源所在。而馆臣对王通此举予以批判，以其为的宋学自然源头不正从而百弊丛生。

然而，馆臣此举并非擅作主张，亦源于乾隆帝的旨意。乾隆帝对于讲学、门户可谓深恶痛绝。乾隆五年诏曰：

惟是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恶。[④]

乾隆十九年，再次有诏：

即如宋元以来，辩析朱、陆异同，初因讲学，而其后遂成门户，标榜攻击，甚为世道人心之害。[⑤]

乾隆帝所谓"道德性命之说""朱、陆异同"诸语，显指宋儒。在他看来，宋儒之好讲学、尚门户此等恶劣学风对于政风影响甚大，如明末东林党即承继此风而致明宗社覆灭、国破家亡。"自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205，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庚申。

② 邓洪波、龚抗云编：《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594 页。

③ 夏长朴：《乾隆皇帝的经学思想及其发展———兼论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关系》，《经学文献研究集刊》2018 年第 1 期。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

⑤ 《清高宗实录》卷 460，乾隆十九年四月庚寅。

欺世盗名之徒托言讲学，谬窃虚声，而明季东林诸人，流而为门户，为朋党，甚至莠言乱政，变易是非”。[①] 乾隆帝对于明代恶习有着深刻认识，而此恶习又由宋儒的不良学风发展而来，此正为乾隆帝贬斥宋学的原由。

馆臣对于王通的批判，乃着眼于批判宋学，而对于宋学之批判，又源于乾隆帝之旨意。且馆臣仅以王通的行为举止来批判宋学，对于乾隆帝以王通“文如其人”的思想来矫正文风、茂选才士之举则未有丝毫涉及。因此，馆臣诸语看似与乾隆帝称赞王通之意相违逆，实则二者皆是为了贬斥宋学。换言之，馆臣可谓对乾隆帝的旨意一以贯之，未有丝毫违背。

二、关于《春秋》之阐释方法

《春秋》一书，乾隆帝尤为重视。乾隆二十三年，大学士傅恒奉敕纂修《御纂春秋直解》一书。同年书成后乾隆帝特撰《序》赞曰：“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②] 由此可见其对《春秋》的属意。不仅如此，乾隆帝对于《春秋》的传播阐释，亦别有心得，同《序》谓《春秋》：

> 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盖辞不待赞也……矧以大圣人就鲁史之旧，用笔削以正褒贬，不过据事直书而义自为比属，其辞本非得已，赞且奚为乎？厥后依经作传，如左氏身非私淑，号为素臣，犹或详于事而失之诬。至公羊、穀梁，去圣逾远，乃有发墨守而起废疾，俨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龈龈聚讼，人自为师……其间傅会臆断，往往不免，承学之士宜何所考衷也哉？[③]

乾隆帝认为,《春秋》之为书，仅是孔子据事直书而已，故子游、子夏对其未有一赞。但自“三传”后，解经家各抒己见，聚讼纷纷，以致后学之士无从考索。故可明乾隆帝对“以传解经”的经学阐释方式不以为然。

不仅如此，乾隆帝又有《三传晋假道伐虢辨》一文。文章伊始便指出，“三传”记载“晋假道伐虢”一事的时间矛盾重重，互相抵牾。其后又认为“晋即不假道，其亡虢之后亦必然将破虞。不系道之假与不假也”，从而对“三传”的事实记载予以否定。最后更直抒“‘三传’之烦辞皆不必信，而唯信《经》之记载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五年‘晋人执虞公’斯可”。[④] 由此可见，乾隆帝对“三传”予以批驳，并不信其记录，而唯信《春秋》原经之文字。

那么，乾隆帝认为应如何阐释《春秋》经？他晚年作有《石刻蒋衡书十三经于辟雍序》一文，其中对经书应当如何阐释有过总纲：

> 若夫历代注疏，入主出奴，纷如聚讼，既冗且繁。衡祇书诸经正文，余概从删，是也。或以为不观注疏，何以解经？予则以为：以注疏解经，不若以经解经之为愈也。学者潜心会理，因文见道，以六经参互之，必有以探其源而晰其奥者，是在勤与明而已。[⑤]

其后，乾隆帝作《圭帽说》一文时，再次重申其观点：“予近为《石刻十三经序》，以为以注疏解经，不如以经解经者。”[⑥] 在乾隆帝看来，对于经之阐释，不应依靠外部阐释，而应直探六经，就经释经。那么，对于《春秋》，其否认“三传”对于《春秋》的阐释效用，无疑认为就《春秋》的原文本释解《春秋》或以其他五经参释《春秋》才是正确的阐释方法。

然而，馆臣却对“三传”极为重视，《春秋经筌》提要载：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129，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甲子。

② 《清高宗实录》卷 568，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丁卯。

③ 《清高宗实录》卷 569，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丁卯。

④ 《御制文二集》卷 24《三传晋假道伐虢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 10 册，第 736 页。

⑤ 《御制文三集》卷 9《石刻蒋衡书十三经于辟雍序》,《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 10 册，第 939 页。

⑥ 《御制文三集》卷 3《圭帽说》,《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 10 册，第 895 页。

> 夫“三传”去古未远，学有所受……“元年，春，王正月”……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不能知声子、仲子事也。“郑伯克段于鄢”，不言段为何人……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为武姜子、庄公弟也。然则舍传言经，谈何容易。①

《春秋三传辨疑》提要曰：

> 平心而论，左氏身为国史，记录最真，公羊、穀梁去圣人未远，见闻较近，必斥其一无可信，世宁复有可信之书？②

在馆臣看来，“三传”的记载当为可信，且若无传文，经文所述之事无从考证。换而言之，在馆臣眼中，阐释《春秋》经文必须依靠“三传”。这完全违背了乾隆帝弃传解经的意旨。不仅如此，馆臣在肯定“三传”的同时，甚至直接否认乾隆帝倡导的以经解经之说。清王心敬有《春秋原经》一书，《总目》载其“尽废诸传，惟以经解经”，但此种解经方法“不思经文简质，非传难明。即如‘郑伯克段于鄢’一条，设无传文……但据此六字之文，抱遗经而究终始，虽圣人复生，沈思毕世，无由知其为郑伯之弟，以武姜内应作乱也。是开卷数行，已窒碍不行，无论其余矣”。③可见，馆臣认为王氏虽凭借以经解经之法阐释《春秋》，但“开卷数行”就“已窒碍不行”，可见此内证之法实窒碍难通。由此，在馆臣视野里，以经解经之法并不具备阐释效用，解经仍需依靠“三传”的记载才能得到有效阐释。

馆臣与乾隆帝就《春秋》经文应如何阐释所持的意见实相互抵牾。原因何在？细探后发现，乾隆帝弃“三传”与馆臣赞“三传”虽形式相异，但其目的却具有一致性——对“言”进行控制。而二者形式有异，乃馆臣和乾隆帝身份不同所致，这需要从两方面予以讨论：

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乾隆帝对《春秋》极为重视，但后世经学诸家对《春秋》的阐释可谓众说淆乱。而乾隆帝又倡导以经学治国理政，其即位之初即宣称“‘五经’乃政教之原”，④后又强调“帝王经世之道，具在‘六经’”。⑤可见，“经”事关国事，兹事体大。如放任儒者对经予以任意阐释，势必导致政治混乱。因此，乾隆帝势必收拢对经学的解释权，缩小其阐释边界，从而对“言”予以控制。故乾隆帝弃传解经并倡导以经解经之法，乃试图消弭因以传释经而造成的学、政两界言论混乱的境况。

另一方面，馆臣倡导以“三传”释解《春秋》亦是“言”的混乱所致。馆臣认为，自唐啖助、赵匡攻驳“三传”，遂致异说蜂起，至宋孙复全弃传文，更致无穷之弊端，此即馆臣“自啖助废‘三传’，而谈《春秋》者日盛……空言易骋，兹亦明效大验矣”⑥以及“啖助、赵匡攻驳‘三传’，已开异说之萌，至孙复而全弃旧文，遂贻《春秋》家无穷之弊”⑦诸语所论之意。可见，在馆臣看来，《春秋》异说纷起之弊乃学者弃传谈经而致。故其肯定“三传”的价值并倡导以“三传”解经。而馆臣此种做法亦是有感于“言”的混乱局面从而试图凭借“三传”对众说之“言”予以控制，使《春秋》的阐释范围局限于“三传”，其与乾隆帝之目的可谓如出一辙。但二者目的一致，缘何采取的措施如此南辕北辙？其实，这与双方身份相异有关。这亦需从两方面予以论述：

一方面，乾隆帝以帝王身份对“言”予以控制。其认为《春秋》乃天子之事，反复强调

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7《春秋经筌》，第352页。
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8《春秋三传辨疑》，第357页。
③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31《春秋原经》，第408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21，乾隆元年六月己卯。
⑤ 《御制诗四集》卷14《题帝王经世图谱》，《御制诗文全集》第6册，第450页。
⑥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7《春秋后传》，第346页。
⑦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27《春秋经筌》，第352页。

“《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①]“盖《春秋》者天子之事”。[②] 其用意为何？乾隆朝庄存与一段话可解此惑：

> 《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③]

庄氏认为《春秋》为后世垂法，以示圣心，实际上即意味着在当时语境下掌握圣人权力的帝王拥有对《春秋》评判与阐释的权力。那么，乾隆帝基于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④] 一语而多次强调帝王对《春秋》书写的控制权，即昭示着乾隆帝视阐释《春秋》为天子私事。因而，乾隆帝弃传解经也就不难理解了：“三传”乃儒者解经的成果体现，非是帝王意志。故乾隆帝提出以经解经之法乃试图通过帝王本身对经的理解以达到其控制经学解释权的目的。

另一方面，馆臣以官方学者身份对“言”予以控制。馆臣此身份拥有两层内涵：第一，官方性。馆臣乃乾隆帝代言人，其身份的官方性毫无疑义，且以乾隆帝意志为准的，故他们在《总目》中将《春秋》的最终阐释权亦归为乾隆帝。奉乾隆帝旨意敕撰而成的《御纂春秋直解》一书，馆臣认为“是编恭承训示，务斟酌情理之平……《春秋》之学已更无余蕴矣”。[⑤] 从此提要来看，代表官方意志的馆臣亦将《春秋》的最终评判权归于乾隆帝。第二，学者性。乾隆帝作为帝王，可以毫无顾忌地倡导弃传解经而罔顾此法的空想性，但作为学者，恰如前引馆臣所言，他们深知仅靠“以经解经”之法阐释《春秋》，无疑寸步难行。宋赵鹏飞“以说经者拘泥三传”而作《春秋经筌》一书。此书“主于据经解经”，但馆臣讥讽其“至谓经书‘成风’，不知为庄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阙疑。张尚瑗《三传折诸》讥其臆解谈经，不知《左氏》有成风事季友而属僖公之事，不值一噱，颇为切中其病”。[⑥] 赵氏弃传不顾，以经解经，不知“成风”为何。但《左传》载有“成风事季友而属僖公”一事，即可知成风实乃庄公之妾、僖公之母，故馆臣对赵氏弃传解经的做法予以否定。不仅如此，作为学者的馆臣深知，弃传释经不但不能明白经文，仅就以经解经之法本身来说，亦会横生弊端。例如，清朝朱奇龄的《春秋测微》一书，馆臣认为该书“以意揣量，据理断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实”，“其所自信，在于以经解经。然说‘刺公子买’一条，言‘鲁无杀大夫者，惟此一事’，则未检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说‘刺公子偃’一条，谓‘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隐杀之之谓’，则又未检‘刺买’一条……是亦难言以经说经矣”。[⑦] 朱氏虽以经解经，然未细检经文而致错误连连。在馆臣看来，以经解经的内证之法本身即有不可靠之处。反之，宋朝叶梦得在《春秋传》中，“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更相发明，颇为精核”。[⑧] 叶氏以传释经，馆臣以“精核”赞之，足见其对以传释经之法的肯定。

由此，馆臣一方面基于他们的官方身份，将《春秋》阐释权的最终标准定为乾隆帝，以符合乾隆帝意旨；另一方面，基于其学者身份并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量，又不得不依靠“三传”以释解《春秋》。这是馆臣既要逢迎圣心又要符合现实考量而采取的折中之法。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143，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辛未。
③ 庄存与：《春秋正辞》，《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20 页。
④ 朱熹：《孟子集注》卷 6，《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76 页。
⑤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29《御纂春秋直解》，第 369 页。
⑥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27《春秋经筌》，第 352 页。
⑦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31《春秋测微》，第 405 页。
⑧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27《春秋传》，第 343 页。

三、对于香奁体的态度

乾隆四十六年，皇帝在检阅四库馆进呈之书时，发现“有朱存孝编辑《回文类聚补遗》一种，内载美人八咏诗，词意媟狎，有乖雅正”，进而降谕：

> 自《玉台新咏》以后，唐人韩偓辈，务作绮丽之词，号为香奁体，渐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诗格更为卑下。今《美人八咏》内所列《丽华发》等诗，毫无寄托……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句，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有《美人八咏》诗，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①]

显然，乾隆帝认为香奁体之作绮丽浮靡，诗格卑下，有伤其崇尚雅醇之至意，故对其有贬无褒，并令馆臣详细检查，凡发现此类著作即行撤出。

然而，翻检《总目》，馆臣没有完全遵照乾隆帝意旨。《白鹭洲主客说诗》提要载：

> 夫先王陈诗以观民风，本美刺兼举以为法戒。既他事有刺，何为独不刺淫？必以为《郑风》语语皆淫，固非事理；必以为《郑风》篇篇皆不淫，亦岂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趋向，形于咏歌，不必实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读曲》诸歌，唐人《香奁》诸集，岂果淫者自述其丑？亦岂果实见其男女会合，代写其状？不过人心佚荡，相率摹拟形容，视为佳话，而读者因知为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谅亦如是，此正采风之微旨。[②]

在馆臣看来，《诗经》诸篇，美刺皆备。《香奁》诸集亦类此，其所描摹之内容，乃非真实的男女会合、淫者述丑此类绮丽浮靡之状，而是“摹拟形容”，从而使读者知衰世之音，此可谓正得采风之微旨。由此，馆臣将《香奁》诸作与《诗经》相比拟并肯定前者“刺”的功能。

又如，《香屑集》提要载：“是编皆集唐人之句为‘香奁诗’，凡古今体九百三十余首。”[③] 乾隆帝明令撤出体近香奁之诗，但清人黄之隽所编《香屑集》，搜集的正是“香奁诗”，此集恰是模仿《香奁集》而作。馆臣此举可谓公然违逆乾隆帝的意旨。那么，原因为何？我们首先从黄琼谊《〈四库全书总目〉对乾隆旨意依违之例——以集部为考察中心》一文中的相关部分谈起。

黄氏亦举《白鹭洲主客说诗》与《香屑集》两提要说明馆臣对乾隆帝的不同意见，并将此间之差异归因于纪昀所致。黄氏的依据有两点：第一，认为其依据的殿本《总目》出自纪昀。第二，基于第一点，黄氏又从探讨纪昀的文学思想出发，认为纪昀着力寻找“诗言志”与“思无邪”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依附“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另一方面“适度地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男女情感”，故对香奁诗此类作品持宽容的态度——这与乾隆帝忽视“性情”的意旨相左。[④] 归而论之，黄氏认为殿本《总目》体现了纪昀的意志且纪昀与乾隆帝的文学思想具有不一之处，此乃《总目》之著录与乾隆帝之意旨出现偏差的原因。黄氏此论看似合理，但实则值得商榷。

无论何种版本的《总目》，目前尚未有显明证据证明出自纪昀一人之手。虽然早年多有学者认为《总目》乃纪昀一家之言，特别是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与《纪昀评传》二书列举多条依据来证明此点，但司马朝军早已对周文所列证据一一驳斥，认为《总目》体现的是18世纪一个时代的心理，不是纪昀一己之作。[⑤] 近年，周氏又撰《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再检讨》一文，检讨其早年的观点，虽然仍坚持纪昀对《总目》的著作所有权，但

---

①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上谕》，第10页。

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8《白鹭洲主客说诗》，第227页。

③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3《香屑集》，第2352页。

④ 黄琼谊：《〈四库全书总目〉对乾隆旨意依违之例——以集部为考察中心》，《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第121期，2011年。

⑤ 司马朝军：《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2期。

也承认《总目》保留了除纪昀之外的意见。[①] 而在此稍前，何宗美等学者强调《总目》具有明显的"官学"特征，[②] 皆不视《总目》为纪昀私作。依据前人提供的确凿之证，我们只能肯定《总目》的《易类・小序》《诗类・小序》等为纪昀之作，[③] 但从整体上看，皇皇二百卷《总目》只能视为以乾隆帝旨意为指导且体现官学意识的一部时代集体之作，无法视为纪昀"独立完成"之作。

黄氏一方面以纪昀所作《白鹭洲主客说诗》提要的内容为据，认为其依附儒家温柔敦厚式的诗教说，未敢明目张胆反对乾隆帝之论；另一方面又以纪昀《云林诗钞序》《冰瓯草序》等为依据，大篇幅详细论证其重视"性情"之文学思想，从而视黄之隽等人的香奁之作为抒发性情之作，故予以肯定而收入《总目》。尚不论《白鹭洲主客说诗》等提要内容的撰写未能明确归于纪昀，更为重要的是，与黄氏观点相反，笔者认为，馆臣收入香奁诸作的原因，恰在于黄氏忽略的儒家"诗教"说，而非其重视的"性情"说。

首先，我们将《总目》中，黄氏论文已涉及、尚未涉及的有关香奁之诗的诸多提要一一罗列：

《经部・白鹭洲主客说诗》："夫先王陈诗以观民风，本美刺兼举以为法戒……唐人《香奁》诸集，岂果淫者自述其丑？亦岂果实见其男女会合，代写其状？……此正采风之微旨。"[④]

《集部・香屑集》："是编皆集唐人之句为'香奁诗'……虽其词皆艳冶，千变万化，不出于绮罗脂粉之间，于风骚正轨未能有合。而就诗论诗，其记诵之博，运用之巧，亦不可无一之才矣。"[⑤]

《集部・南湖诗集》："是集诗多艳体，颇涉佻薄，殆《玉台》《香奁》之末流。"[⑥]

《集部・唐诗叩弹集续集》："然如……韩偓《香奁集》诸诗，皆所谓靡靡之音，一概滥登，于精审犹有愧焉。"[⑦]

《集部・后村诗话前集后集续集新集》："谓吴融、韩偓，国蹙主辱，绝无感时伤事之作，似但据《唐英歌诗》《香奁集》，而于《韩内翰集》则殊未详阅，持论亦或偶疏。"[⑧]

《集部・曝书亭集附录》："夫绮语难除，词人常态，然韩偓《香奁集》别为篇帙，不入《内翰集》中，良以文章各有体裁，编录亦各有义例。溷而一之，则自秽其书。今并刊除，庶不乖风雅之正焉。"[⑨]

可以看出，馆臣对香奁体的评价采取了别有用心的安排——于经部持褒扬之态，于集部则基本持贬斥之态。经部之例前已论及，不赘述。集部诸例中，从性质上看，在《南湖诗集》《唐诗叩弹集续集》二提要里，馆臣将香奁诗定性为"艳体""靡靡之音"。在体例方面，针对《曝书亭集附录》《香屑集》等提要，馆臣认为，若韩偓把《香奁集》混入其《内翰集》，则为自秽其书之举。从内容来说，对于《后村诗话前集后集续集新集》提要，馆臣认为《香奁集》里完全没有感时伤事的作品。总之，就集部而言，在对香奁体的评价上，馆臣其实与乾隆帝一致，

---

① 周积明：《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再检讨》，《中国四库学》2019 年第 2 期。

② 何宗美认为："《总目》批评体系的宏构性，体现了内在建构的官学体系特点，是编纂者在皇权授意下精心设置的反映官学意识的架构。"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官学体系、特征及其缺失——以明代文学批评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3 期。

③ 司马朝军：《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图书馆杂志》2007 年第 2 期。

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18《白鹭洲主客说诗》，第 227 页。

⑤《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173《香屑集》，第 2352 页。

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176《南湖诗集》，第 2424 页。

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194《唐诗叩弹集续集》，第 2729 页。

⑧《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195《后村诗话前集后集续集新集》，第 2751 页。

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173《曝书亭集附录》，第 2345 页。

都极力贬低。

其次，为何馆臣在经、集二部持相反之态？其实，这与清代文坛对于诗歌诠释方法的改变有关。诗学家们将以往视为“艳情”的诸诗作纳入比兴寄托的诠释范畴，从而赋予了诸艳诗全新之貌。清初，冯班兄弟、吴乔等人即主张以比兴说诗，如冯舒谓：“诗无比兴，非诗也。读诗者不知比兴所存，非知诗也。”① 吴乔言：“明人不知比兴而说唐诗，开口便错。”② 而在此期强调比兴说诗的同时，最突出的现象则是李商隐被重新认识。自晚唐到明末，李商隐之作几乎被视为“艳诗”，在儒家诗学体系中的总体评价甚低。但明末清初的道源为其翻案。钱谦益所作《注李义山诗集序》，记载了其与道源的对话，其中道源说：

> 而义山则徒以绮靡香艳，极《玉台》《香奁》之致而已。……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钳结，若喑而欲言也，若魇而求寤也，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辞，婉娈托寄，隐谜连比，此亦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也。吾以为义山之诗，推原其志义，可以鼓吹少陵。③

据张健言，道源此论，确立了对李商隐诗歌一种新的诠释方式，即将前人视为男女恋情之艳作放入到儒家象征性比兴的传统中去考察，从而极大提高了李商隐诗歌的地位。④ 嗣后，钱谦益、朱鹤龄、吴乔等人也有类似之言，李诗遂极受重视。基于此种状况，与李商隐本为舅侄，又同以写“艳诗”著称的韩偓亦被“发现”。吴乔说：

> 《香奁诗》有云：“动天金鼓逼神州，惜别无心学坠楼。不得回眸辞傅粉，更须含泪对残秋。折钗伴妾眠青冢，半镜随郎葬杜邮。惟有此宵魂梦里，殷勤相觅凤池头。”观其起句及“杜邮”“凤池”，当是李茂贞兵逼京城，昭宗赐杜让能死，代其姬人之作。“残秋”对“傅粉”，似乎趁韵，然其事在景福二年九十月间，正是残秋也。而题绝不相类，将讳之，抑传写误也。让能之死可悯，致尧于此，宜有诗以哀惜之也。⑤

致尧即韩偓之字，吴乔认为其《香奁诗》乃时事之反映，非是纯写恋情。可见，韩偓的《香奁诗》与《玉溪诗》类似，从“艳诗”的传统中解放了出来，转而被放入了比兴寄托的全新诠释中，从而获得了正统诗教的内涵。

最后，基于以上所述可知，馆臣于经、集二部对香奁诗持截然相反之态，实乃馆臣有意的安排。一方面，馆臣在经部的《白鹭洲主客说诗》提要中，以《诗经》的比兴寄托法诠释韩偓《香奁集》，认为其反映了当时的世事，此正得采风之旨。换言之，经部涉及的香奁诗，未被馆臣视为纯粹的文学之作，而是以“经”的价值来衡量这些“艳诗”。在此意义上，此提要中的诸香奁诗实乃“经”之另一载体，而乾隆帝视香奁诗为文学作品。二者不属于同一体系。

另一方面，集部中，上举《香屑集》《南湖诗集》等诸提要基本对香奁诗有贬无褒，唯一有所褒扬之语乃《香屑集》提要：“而就诗论诗，其记诵之博、运用之巧，亦不可无一之才矣。”显而见之，馆臣此处所赞乃局限于此“香奁诗”文字、语言以及技巧运用的博与巧，纯粹是对其诗艺的赞赏，而对其诗之实质仍以“于风骚正轨未能有合”，予以贬斥。其余提要亦以“诗多艳体，颇涉佻薄”“皆所谓靡靡之音”“绝无感时伤事之作”“乖风雅之正”诸语予以抨击。可见，虽因诠释方法的改变，文坛对香奁诗的看法，已与从前迥异，但于集部，馆臣仍遵循传统，视香奁诗为文学作品之“艳诗”，并没有将其纳入风骚的比兴寄托中予以考察。究其原因，乃与当时文坛境况和乾隆帝意旨有关。

第一，虽然文坛存在前述以比兴寄托诠释香奁诗的状况，但并非所有文人都认同此点。例

① 冯舒：《游仙诗叙》，冯班：《钝吟全集・游仙诗》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② 吴乔：《围炉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82页。
③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5《注李义山诗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03–704页。
④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⑤ 吴乔：《围炉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496页。

如，王士禛、王士禄兄弟（二王）曾与彭孙遹在京城唱和香奁体。据汪琬载：

> 二王好《香奁诗》，唱和至数十首。刘比部寓书于余，问询博士（按，指王士禄）曰："王六不致黦韩冬郎云雾否？此虽慧业，然并此不作可也。"按博士《香奁诗自序》云："情至之语，风雅扫地，然不过使我于宣尼庑下俎豆无分耳。"盖其托兴如此。[①]

可见，王士禄虽认为作香奁诗乃"风雅扫地"之事，但仍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进行创作。换言之，王氏诸人仍以"艳诗"的视角看待香奁诗。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意旨对香奁诗持极尽贬低之态，视其为"浮靡"之作。受乾隆帝的影响，馆臣在集部又视香奁诸作为纯文学之作。在乾隆四十六年关于香奁诸作的宣谕中，乾隆帝明确表示：

> 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无邪"。即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当原本风雅，归诸丽则，所谓托兴遥深，语在此而意在彼也。[②]

可见，乾隆帝认同《诗经》的比兴寄托传统，而香奁诗却被其下令"一并撤出"。由此可知，经、文二者在乾隆帝视野里可谓泾渭分明，未有丝毫相通性。

要言之，乾隆帝视香奁诗为文学作品，而馆臣在经部肯定香奁诗的价值，乃是基于儒家诗学体系中诠释方法的改变，以释解《诗经》的比兴寄托来诠释香奁诗，从而使其具有了"经"的价值内涵。此举看似违逆了乾隆帝意志，但其实与乾隆帝所论根本不属于同一范畴。又，当时文坛尚存留视香奁诗为艳诗的传统，此乃馆臣在集部对香奁诗评价甚低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在集部，馆臣遵循了乾隆帝旨意，视香奁诗为纯文学之作，进而对其予以贬斥。由此来看，馆臣其实并未违背乾隆帝意旨。

至此，我们仍有一问题尚未解决——乾隆帝明令馆臣撤出所有香奁诸作，但在《总目》中，馆臣怎敢收录《香屑集》《南湖诗集》等提要？黄琼谊在其文中亦以《香屑集》提要为例说："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有不遵从乾隆帝意旨，加以著录香奁体著作，正是并未一体照办之例。"[③]但实际上，黄氏此言有冤枉馆臣之嫌。因为在前文列举的集部诸提要中，诸如《南湖诗集》《唐诗叩弹集续集》此等提要，皆被馆臣斥入存目，而存目之书，是不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收入《四库全书》又涉及对香奁诗进行评价的《后村诗话前集后集续集新集》《曝书亭集附录》《香屑集》三书，在前引提要中可明，前二著在内容上根本未涉香奁体，馆臣仅是援引韩偓《香奁集》的内容与编录对二书进行评价。后一著馆臣明确对其香奁诗的性质进行贬斥，而纯就对其诗技进行欣赏。换言之，在馆臣眼中，此著并非因香奁体的体裁原因而被收入《四库全书》。《〈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记载："小山艳曲，削香奁脂盝之篇。"[④]馆臣已明言削去香奁诸作且此表写成后经乾隆帝御览审定，故前者对后者的禁令已做了公开回应，断不可能逆其意愿。再者，《总目》著录文集的《凡例》言：

> 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宋人朱表青词，亦概从删削。其倚声填调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遗音》、张可久之《小山小令》，臣等初以相传旧本，姑为录存，并蒙皇上指示，命从屏斥，仰见大圣人敦崇风教、厘正典籍之至意。[⑤]

可见，乾隆帝明令屏斥的乃倚声填调之词，香奁诗未被涉及。因而，馆臣将诸香奁体之书或列为存目或在正目中予以贬斥，亦未碍乾隆帝之意。

至此，我们方可真正明晓，馆臣在对香奁诗的态度上，其实亦并未逾越乾隆帝意旨。

---

① 汪琬：《说铃》，雷瑨：《清人说荟》第二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070页。

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上谕》，第10页。

③ 黄琼谊：《〈四库全书总目〉对乾隆旨意依违之例——以集部为考察中心》，《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第121期，2011年。

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进表》，第12页。

⑤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33页。

四、结语

何宗美曾言，《总目》之诸言最终折中于乾隆帝之“天裁”。[①] 斯言良是！尤其在涉及重大原则问题时，馆臣无不以乾隆帝之意旨为准的。对王通的评价，涉及如何对待宋学这一关乎意识形态领域之偏向性的问题；对《春秋》的看法，涉及如何掌控经学阐释权力的问题；而对香奁体的态度，涉及文体文风这一关乎世道人心的问题。馆臣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皆与乾隆帝意旨保持一致。[②] 虽然二者形式相异，但二者之目的与归宿可谓始终同步划一。至于乾隆帝对王通“文如其人”思想的肯定，以及将香奁体视作文学之作的相关举措，在馆臣对王通展开否定性评价、于经部赋予香奁体以“经”之价值的学术探讨中，并未得到任何论及。二者虽以同一对象为讨论目标，但所讨论之事实属于两个范畴。因此，不能据此认为馆臣违逆乾隆帝意旨。而馆臣基于其学者性，在对《春秋》的阐释方法与乾隆帝意见相左时，亦是将最终阐释权定为乾隆帝的基础上再来论述以传解经的合理性和以经解经的不合理性。王明珂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构成我们所信赖的‘历史’，而是当前的社会事实（或社会现实）使得我们选择某些历史事实……”[③] 馆臣在编撰《总目》时亦面临此问题，基于面向乾隆帝与面向学界此双重社会现实性的考虑，在撰写提要时，不得不选择了一些看似与乾隆帝意旨相违背的材料，但对诸材料进行实质性地剖析后，可以发现，馆臣无不小心翼翼地迎合乾隆帝意旨。对于乾隆帝的禁令，馆臣可谓无一触碰。

References

Chen Zuwu. *Qianjia xuepai yanjiu* (Research on the Qianjia school of thought).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2011.

Deng Hongbo, and Gong Kangyun. *Zhongguo zhuangyuan dianshijuan daquan*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top scholar hall exam papers). Shanghai: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2006.

Guo Tian. “Songru duiyu wangtong xujing de butong pingjia yiqi yuanyin” (Different evaluations and reasons of Wang Tongxu’s sutra by Song Confucianist). *Henan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4 (2011).

He Zongmei.“*Siku quanshu zongmu*: guanxue tixi dunhao, tezheng jiqi queshi: yi mingdai wenxue piping weili” (Th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deficiencies of official learning: taking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M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Shoudu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3 (2017).

He Zongmei. “Diwang zhi xue:sikuquanshu ji qindingsikuquanshuzongmu de qingdai guanxue jiangou” (The study of the emperor: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dynasty official education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Siku quanshu* and the *Siku quanshu zongmu*).*Wuh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1 (2023).

Sima Chaojun. “Jiyun yu siku quanshu zongmu” (Ji Yun and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ushuguan zazhi* (The library journal) 2 (2007).

---

① 何宗美：《帝王之学：〈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清代官学建构》，《武汉大学学报》2023 年第 1 期。

② 周积明与黄琼谊认为，乾隆帝喜爱元稹、白居易、陆游三位诗人，但馆臣不以此三人为诗界最高典范。此点仅涉及乾隆帝个人对文人的欣赏态度。周、黄二人还论述了乾隆“布帛菽粟之旨”“天理人欲论”以及对元曲、青词等文体的贬斥，但无一例外都局限于文体文风范围内。就本文“香奁体”一章的论述来看，乾隆对“文”并不看重，他重视“香奁体”乃是因为此体事关“世道人心”，所以专门降旨贬斥。就二位学者的论述来看，乾隆帝对元曲、青词等文体的贬斥仅是因为其“乖雅正”，属于文体文风范围内的批评，与世道人心无涉。因此，二位学者所讨论的馆臣违逆乾隆旨意的例子皆不属于重大原则问题，仅局限于“文”的范围，而乾隆对“文”并不重视，故馆臣有较大的阐释空间，甚至与乾隆意志相违背。周积明：《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再检讨》，《中国四库学》2019 年第 2 期；黄琼谊：《〈四库全书总目〉对乾隆旨意依违之例——以集部为考察中心》，《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第 121 期，2011 年。

③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6 页。

Sima Chaojun. *Siku quanshu zongmu bianzuan kao* (A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Wuhan: Wuhan daxue chubanshe, 2005

Wang Mingke. *Fansi shixue yu shixue fansi: wenben yu biaozheng fenxi* (Reflection o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 analysis of text and representation).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6.

Xia Changpu. *Qianlong huangdi yu hansong zhi xue* (Emperor Qianlong and the studies of Han and Song dynasties). In Peng Lin. *Qingdai jingxue yu wenhua* (Confucian studies and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Benjing daxue chubanshe, 2005.

Xia Changpu.“Qianlong huangdi de jingxue sixiang jiqi fazhan: jianlun yu siku quanshu zongmu bianzuan de guanxi” (Emperor Qianlong’s Confucian thought and its development: also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Jingxue wenxian yanjiu jikan*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1 (2018).

Zhang Jian. *Qingdai shixue yanjiu* (Research on Qing dynasty poetic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9.

Zhou Jiming. “Ji Yun yu sikuquanshuzongmu guanxi zai jiantao” (A further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 Yun and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Zhongguo sikuxue* (Chinese *Siku* studies) 2 (2019).

On Examples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Catalog* and the Intentions of Emperor Qianlong

NI Yuh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an University; nniyuhang@ qq.com)

Abstract: Emperor Qianlong agreed with Wang Tong’s idea of being just like a person and recognized his status as a scholar, bu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courtiers criticized Wang Tong. Both critiques were aimed at Song studies, and the officials did not involve criticism of Wang Tong thought of being like a person. Qianlong denied the explanatory effect of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advocated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through the classics, but the courtiers held opposite opinions. The purpose of both was to control “discourse,” bu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identities, they adopted completely opposite forms of interpretation. Emperor Qianlong criticized the style of the incense box and ordered the officials to withdraw all the “incense box” works from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However, the courtiers recognized their value and included them in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Emperor Qianlong regarded the “incense box” as a literary work, while the official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estowed additional value on the incense box as “scripture – like” texts. Although the courtiers’ actions often appeared defiant, they did not fundamentally contradict Emperor Qianlong’s overarching objectives

Keywords: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Catalog*, Emperor Qianlong, the *Siku* courtiers